



海涅选集

海 涅 选 集

张 玉 书 编 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 北 京

海涅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9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frac{1}{4}$ 插页 2

198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4年9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数 48,001—63,500

书号 10019·3514

定价 1.80 元

思想家海涅

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正在赫尔戈兰岛上疗养的海涅听到这个消息，发表了如下一番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我对安静的渴望已经消逝。现在我又知道，我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我是革命的儿子，我又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我要头戴花冠去作殊死的斗争。还有七弦琴，把七弦琴递给我，我要唱一支战歌……话语犹如燃烧的群星，从天空射到地上，焚毁宫殿，照亮茅舍……我心里充满了欢乐和歌唱，我浑身变成了剑和火焰。”（一八三〇年八月十日日记）

然而在德意志，七月革命的反响甚微，这里依然是一潭死水，死气沉沉，鬼影憧憧，到处散发着中世纪、天主教、封建制度的霉烂气味。在德意志，那个“在歌德的摇篮边开始，将在他的灵柩旁终结的艺术时代”眼看即将结束，新时代的诗人再也不能遁入艺术的王国去建立不朽的业绩，而应该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现实斗争中去，象“火和剑”一样地去进行推翻旧制度的殊死斗争。然而，根深蒂固的德意志封建社会是埋没人才、摧残人才、阻碍社会进步的巨大反动势力。“狂飙突进”并没能掀起革命的风暴，德国资产阶级中杰出的才智之士面临强大的封建统治势力，一个个潦倒的潦倒，颓丧的颓丧，早夭的早夭。反对专制暴政的英勇战士、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公民席勒，尽管逃出了符腾堡公园，可是在“礼贤下士”的魏玛公国也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他作为耶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只能在他的历史著作和剧作中让

他的革命的激情燃起冲天的烈焰，去“摧毁”“精神上的巴斯底狱”，“建造”“自由的庙堂”。歌德青年时代以为得到“开明”的公爵的支持，可以施展抱负，实现理想，在弹丸小国魏玛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间乐园。可是生活戏弄了他，他终于被迫出走，逃到意大利古典文艺清澄洁净的空气里，才免得被窒息致死。这两位大师后来几乎完全脱离了现实，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环境的逼迫。诗人的命运如此，哲人的命运亦然，康德一生在刻尼希堡讲学，费希特发表一点独立的见解便被迫辞职，他们只能在哲学的王国里生存，不许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不仅如此，随着警察制度的强化，还有冰冷的锁链在等待着那些“不逞之徒”。这一切对于海涅当然不是令人鼓舞的前景，他于是决定离开故国，前往巴黎。

一八三一年五月一日海涅渡过莱茵河，五月初到达巴黎，从此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歌集》的时代已经过去，诗人在三十年代初，几乎什么诗篇也没有写，但却写了大量的文艺批评，致全力于沟通德法两国人民之间的精神交流和文化交流。他一方面要使法国人民了解德国精神生活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其实是更加重要的方面，是希望德国人民通过了解法国文化和德国文化的真谛而受到鼓舞，勇敢地去行动、去战斗。海涅在《论浪漫派》中说明了他介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思想的动机，他认为要驱散笼罩在德意志国土上的鬼氛妖雾，必须借助于以三色旗为象征的资产阶级理想。

为了使德国大地上闹鬼的丑剧早日收场，海涅在三十年代初拼命挥动三色旗，使劲地诵念降魔驱鬼的咒语。这就是他当时所写的一系列关于政治、宗教、哲学、文艺、绘画、音乐的评论文章。本卷《海涅选集》包括了作者以下几篇著名的文论：《论浪

漫派》(一八三三年以《德国近代文学史略》的书名发表,一八三六年扩大篇幅,以《论浪漫派》的书名发表),《论法国画家》(一八三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六日连续发表在科达主编的《有教养阶层的晨报》上,标题是《一八三一年巴黎画展》,一八三三年又以《论法国画家》为题,收入《沙龙》第一卷),《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八三四年收入《沙龙》第二卷),《精印本〈堂吉珂德〉引言》(一八三七年)、《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一八三九年),以及短篇小说《佛罗伦萨之夜》中关于提琴家帕格尼尼的段落。

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和《论浪漫派》二书中,首先对欧洲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天主教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这个宗教开始在公元一世纪流行于罗马帝国的奴隶中间,尽管遭到血腥镇压,却流传日广,信徒日众,后来连罗马帝国的贵族也偷偷地参加到信徒的行列。这是什么原故呢?原来“在内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罗马帝国,唯物主义发展到惊人的地步,大有摧毁人类精神的一切辉煌成果之势,基督天主教的世界观作为克制这种唯物主义的一剂灵药,是必不可少的。”(《论浪漫派》,第12页)“在这罗马人的世界里,肉身已变得如此肆无忌惮,看来需要基督教的纪律,来使它就范。”(《论浪漫派》,第13页)具有远见卓识的罗马皇帝康士坦丁便在公元四世纪把基督天主教定为国教,于是这个奴隶的宗教便一变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手里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

天主教的教义在信徒必读的《教理问答》这本小册子里已经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书中第一个问题:“人生世上是为什么?”答案便是:“人生世上是为恭敬天主教自己的灵魂。”这就

是说，这个宗教宣传的是崇神，贬人，重灵魂，轻肉身。这样一个简单的教义在历史的长河中竟变成了灾难无穷的锁链，不仅奴役人们的肉体，而且还压迫人们的精神达千百年之久。“君权神授”，谁反对封建统治阶级，便被认为大逆不道，人神共诛，万劫不复。教皇是天主的代表，有权解释天主说的话（《圣经》），于是“教皇无错误论”便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教皇和皇帝可能矛盾重重，争权夺利，但在对付平民百姓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封建统治就这样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虽然在欧洲比在亚洲时间短些，毕竟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为了崇敬天主，崇敬神，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幸福全都可以置之不顾。而为了奴役人民，解除人民的精神武装再也没有比宣扬“灵魂的得救重于肉身的幸福”更有效的了。他们用一张到天堂去兑现的支票欺骗百姓，使人们甘心情愿地受苦受难，放弃正当的基本的物质需求。

对于天主教的这种本质，海涅进一步作了如下的分析：“我谈的那种宗教，其最初的教条就判定肉身有罪，这种宗教不仅承认精神高于肉身，还想消灭肉身，以炫耀精神；我谈的那种宗教，由于它那违反自然的任务，才使罪孽和伪善来到人世，正因为它判定肉身有罪，连最纯洁无邪的感官的快乐也变成了罪孽，正因为人不可能完全靠精神生活，于是伪善便应运而生；我谈的那种宗教，教训人们一切世俗的财富都是过眼云烟，做人应该具有狗样的谦卑，天使般的忍耐，这样，它就变成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支柱。”（《论浪漫派》，第12页）其实，这种特性不仅属于天主教的教义，古往今来哪一种宗教迷信不是宣扬尘世幸福的虚幻，肉身的罪恶和轻贱，物质生活的微不足道，同时极力赞扬天国的极乐，灵魂的崇高和不朽，精神生活的至高无上。海涅还指出，在新的条件下，唯灵主义的宗教迅速没落，反动的基督教假社会主

义者如法国的拉梅耐之流，更以“左”的面貌出现在开始觉悟的人民面前，“他们戴上红帽子，他们发誓要以死和恨来对待所有的帝王，那七个吸血的恶鬼；他们要求平分世上的财产；他们在咒骂方面作得并不亚于马拉和罗伯斯比尔。……假如你们仔细地观察他们，你们就会发现……他们想用革命的毒药裹着的圣体来毒害人民”。（《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263页）这种假社会主义尽管有许多革命词句，其基督教的实质仍然显而易见，最终还是会被人民识破，遭到了人民的唾弃。海涅于是总结道：“因为基督教无法消灭物质，所以它曾到处侮蔑物质，贬低那些最崇高的享乐，以致感官不得不行伪善，并从而产生谎言和罪恶。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妇女穿上新衣和获得新思想，象经过了鼠疫之后一样，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感情进行一次彻底的熏蒸消毒。我们的一切新制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为物质恢复名誉，使物质重获尊严，在道德上被承认，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并和精神和好如初。”（《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264页）这些话虽然说了一百多年，我们今天读起来，实在仍然感到分外亲切。

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还十分深刻地分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进步意义。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古以来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世界观的斗争。天主教的教义当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以康德、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尽管名目繁多，什么不可知论啦，先验唯心主义啦，自然哲学啦，本质上也都是唯心主义的。那么，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和天主教的教义究竟又有什么差别和矛盾呢？德国古典哲学的进步意义又在哪里呢？

海涅告诉我们，按照康德的说法，上帝是一个本体。这个先验的观念本质上只是一种虚构，只是通过一种自然的幻觉而产生的。康德指出，关于那个本体，关于上帝，我们什么也不可能知道，甚至今后也是不可能证明它(或他)的存在。原来，康德的不可知论强调的是人，是人的理性，是人的理性的批判精神。甚至连上帝的存在也得由人来论证，这个论断和崇敬神、轻视人的天主教教义相比，是一个何等巨大的转变啊！康德所以引起了这次巨大的精神运动，海涅认为，与其说是由于他的著作的内容，倒不如说是通过他的著作中的那种批判精神，那种现在已经渗入一切科学之中的批判精神。所以，可以说，康德用他的哲学体系斩杀了上帝，海涅因此把他和罗伯斯比尔相比，甚至认为这位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还超过了那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

接着，海涅还把康德的学生费希特比作拿破仑。在康德学派完成了恐怖主义的破坏工作之后，出现了费希特，就象国民议会用一种纯粹的理性批判摧毁了整个旧时代之后，出现了拿破仑一样。拿破仑和费希特都代表着这个伟大的、严酷的自我，都以各自设计的庞大建筑证明了一个巨大的意志。但是，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所强调的自我，并不象他的反对者所嘲笑的，是他个人的自我，而是和神相对立的“人”的自我。海涅称赞的“巨大的意志”，便是自觉的“人”的意志。这里充满了“人”的高傲，“人”的尊严，强调“人”的精神和思想的独立性。反动派并不愚蠢，他们从费希特的学说中敏感地嗅到离经叛道的气味。这个“自我”变得“全能”，那么把“全知全能的上帝”又放到哪里去呢？于是一七九四年开始在耶拿大学讲学的费希特，不到四年，在一七九八年便被加上“主张无神论”的罪名而受到控告，最后被迫离开了耶拿。

事实上，费希特也直言不讳地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在他那篇受到控告的论文《论我们信仰上帝的世界统治的根据》里，费希特写道：“……活生生的、作用着的道德秩序就是上帝；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上帝，也不能理解任何其他的上帝。”费希特还宣称，除了感情的存在之外，他的知识学不知道有其他任何存在。正因为只能对经验的诸对象赋予一个存在，费希特把人们头脑中的上帝身上所有的感性附加物去除干净之后，就无异于宣布上帝并不存在。原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就是这样在强调“人”的“自我”的同时，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只有在封建迷信的淫威之下受尽苦难、吃尽“神”的苦头、作为“人”而备受轻蔑屈辱的人，才会体会到否定上帝的存在是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行动。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巨大解放，是思想上的伟大革命。所以，海涅希望这哲学上的革命也会引起政治上的革命。他以当时难能可贵的明晰语言写道：“德意志民族不是个轻举妄动的民族；当它一旦走上了任何一条道路，那末它就会坚韧不拔地把这条道路走到底。在宗教事件中如此。在哲学中也如此。在政治上我们能否同样彻底地前进呢？”（《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305页）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经费希特、谢林深化发展，到黑格尔集其大成，在它拙劣僵硬的文体下面竟掩盖着这样震撼世界的革命思想，大部分同时代人没有发现。但是在一八三三年至少有一个人看到了这点，并且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人们。这个人就是海因利希·海涅。这表明海涅不仅是一个歌唱玫瑰、荷花、爱情和爱情的烦恼的夜莺，更是一个呼唤革命风暴的海燕。他不仅是诗人，更是一个目光犀利、思想深邃的思想家。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里肯定了海涅的这一功勋：“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

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革命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啊！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个人在一八三三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海因利希·海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210—211页）

海涅在《论法国画家》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艺术创作规律。他说，评论家们常常错误地提出“艺术家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他应当正确地探讨“艺术家想做什么？”或者“艺术家不得不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是由那些艺术哲学家提出来的，他们自己并没有文艺创作经验，不过把不同艺术作品的特征抽象化，根据现有的东西为将来的一切确定规范，区分门类，想出定义和法则；而所有这样一些清规戒律、条条框框，充其量只能用来品评那班专以摹仿为能事的人们。至于一切有个性的艺术家，海涅反复强调，只能按他们自己特殊的、独创的、与生俱来的审美标准加以评价。

这正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文艺创作实践、深知创作的甘苦、取得巨大成功的艺术家的肺腑之言。如果不曲意吹求，海涅的意思是很明白的：文艺创作永远需要创新，不能用陈旧的东西总结成清规戒律来束缚艺术家的思想和手脚。文艺创作全靠艺术家内心的创作激情，不能靠别人的意志去强迫他写这写那。政治斗争的需要只有在化为艺术家内在的愿望和激情时，才能产

生动人心弦的杰作。《马赛曲》和《国际歌》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它们何尝不是艺术家接受任务以后创作的？博马舍创作《费加罗的婚礼》也绝不是奉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之命去为革命做舆论准备。便是海涅本人，他在一八四四年元月完成《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初稿时，认识马克思才一个月呢。成天要求艺术家做这做那，干涉文艺创作，只会使文艺降低到宣传品的水平，其结果必然使文艺的花坛上笼罩着肃杀的秋意，百花凋残，满目凄凉。海涅在《论浪漫派》里嘲笑了德国浪漫派的首领奥·威·施莱格尔和他的弟弟弗·施莱格尔致力于传播“新的美学教条”，“给未来的艺术作品开药方”。不要以为，施莱格尔兄弟在这方面之所以碰壁，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艺创作，或者没有出色的文艺创作；即使这位艺术哲学家自己有过一点创作实践，对文艺创作并非彻头彻尾的外行，海涅认为他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和传播什么“新的美学教条”。再看被誉为德国文学之父亲的莱辛，他不仅在戏剧方面有十分成功的创作实践，写下了《爱米丽娅·迦洛蒂》，《明娜·封·巴恩海姆》这样出色的剧作，而且在寓言、诗歌等方面都有大量的实践。但是，海涅尽管对莱辛人格的高尚和艺术的成就都十分敬仰，他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位先辈身上不幸也有这个想“为未来的杰作开药方”的弱点。才力和成就都不如莱辛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为未来的杰作开药方”是不可取的，但是公允地评判过去的文艺作品，恰如其分地评价前辈和同辈的作家，却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方面，海涅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海涅认为在世界文学宝库里，莎士比亚戏剧取得了不可超越的成就，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是西班牙人塞万提斯创作的，而在

诗歌方面，最杰出的歌手乃是歌德。他说，塞万提斯在叙事诗方面、莎士比亚在戏剧方面和歌德在抒情诗方面组成了“诗人的三人统治”。他甚至以诗人的幽默口吻建议，等各国人民把自己的政治事务料理完毕之后，让德国人，不列颠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一同到翠绿的森林中去纵情歌唱，让夜莺来做裁判。他深信，沃尔夫冈·歌德的歌曲在这场歌咏比赛中必将获胜。

《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一书集中地反映了海涅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对戏剧艺术的某些观点。早在中学时代（1812—1816），海涅便在故乡杜塞尔多夫的图书馆里借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一八一九到一八二〇年在波恩大学学习时，他结识了德国浪漫派的首领之一、莎士比亚剧作的优秀翻译家奥·威·施莱格尔，无论在私人交谈中，还是课堂演讲时，施莱格尔都向海涅介绍过这位杰出的戏剧家。就在这时，海涅自己还写过一部悲剧《阿尔曼梭》，在写作过程中认真地学习过莎士比亚的名著《罗米欧与朱丽叶》。此外，一八二七年夏，海涅访英时，还经常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观看他的剧本的演出。因此，当巴黎的出版商德洛耶在一八三八年春约请海涅为英国名家制作的四十五幅铜版画配词时，海涅稍事犹豫便接受了；他之所以犹豫，是因为其中一些肖像画的画风沿袭了大卫古典主义画派传统，而海涅在绘画方面主要欣赏卢本斯和德拉克罗瓦的画风。然而，对莎士比亚的浓厚兴趣和深刻理解压倒了一切，海涅于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和出版商签订合同，答应在七月底交稿。在短短三个月内，海涅阅读了大量参考资料，其中包括施莱格尔的《剧评讲演稿》和蒂克的《剧评札记》，并通读了施莱格尔和蒂克翻译成德文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五月中旬海涅患眼病，大夫

禁止他读书写字，他到七月初开始口授，不到三个星期便写完了全书，共一百一十二页。这本深刻而优美的莎士比亚评论，不仅帮助我们提高对这位伟大戏剧家的欣赏水平，更可以让我们从中认识作者本人作为伟大诗人的亦庄亦谐的精神风貌。

海涅从少年时代起便爱读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这本书最好的德译本是德国浪漫派作家路特维希·蒂克译出的。海涅在《论浪漫派》中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矛盾：一方面《堂吉珂德》这本书把浪漫主义的愚蠢嘲弄得淋漓尽致，因为浪漫派身上的疯狂正是鼓舞那位高贵的曼却郡人去干种种傻事的那种疯狂，浪漫派也想使中世纪死气沉沉的骑士制度复活过来；然而另一方面，却是浪漫派把这本书的最好的译本送给了我们。海涅认为，塞万提斯是一个现代作家。他的这部巨著主要反对人们在现代还用骑士小说来把广大读者拉回中世纪去。骑士小说不仅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是过时的，不合时宜的，而且就其政治倾向而言，也是反动的，它美化中世纪封建宗法制度、骑士制度和宗教迷信，讴歌骑士的英雄事迹和美人的贞淑品德，从而使人沉湎往日，留恋过去，忘怀当前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然而，在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西班牙，在宗教裁判所横行无忌的时代，塞万提斯要进行这场斗争必须采取独特的方式，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才不至于让这个神圣衙门的仆役抓到任何把柄。于是，他不得不运用幽默和讽刺作武器，并以卓越的才能运用这种武器，创作出举世闻名的《堂吉珂德》，一举击溃了当时充斥书肆、泛滥成灾的骑士小说。创作这部旷世杰作的同时，塞万提斯还为一种新的文艺形式提供了一个范例，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现代长篇小说。海涅正是这样评价塞万提斯的：伟大的诗人通常在摧毁旧事物的同时，同时也建立了一些新事物；他们如不肯定什么东

西，是绝不轻易否定的。

海涅本人在和德国浪漫派作斗争时，也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以上的原则。例如，他在《论浪漫派》中谈到，他少年时代坐在杜塞尔多夫故宫的废墟上，朗读乌兰特的那些以牧童、公主、无头的女人、古老的鬼怪为内容的浪漫主义诗歌时，曾经非常感动，十分心折；可是时间在推移，世界在变化，他的寓所所在的“这条大街上翻腾着大天白日的滚滚浪涛，响彻了新时代的最强音，嘻笑怒骂，鼓声隆隆，国民近卫军迈着快步从街上走过，人人都说法国话。难道在这种地方能够诵读乌兰特的诗集吗？”浪漫派的诗歌和新时代实在格格不入了，可是要把它们加以驱逐，取而代之，靠“破字当头”的行政命令是办不到的，还要有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更好的作品来战胜它们。正象塞万提斯用《堂吉珂德》摧垮骑士小说一样，海涅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时代的诗》这样的“新的歌，更好的歌”^①战胜了浪漫派的诗歌。

对于作为诗人的歌德，海涅是极其钦佩的。可是歌德的为人沾有不少庸俗的气息，海涅对此十分反感。一八二四年秋天，海涅徒步漫游哈尔茨山，归途中到魏玛访问歌德，这是两位诗人唯一的一次会晤。这次见面不欢而散，歌德嫌海涅狂妄自大，海涅则感到歌德对后起之秀态度冷淡。一八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海涅在给他的朋友摩西·摩色尔的信里写道：“我讨厌贵族的奴才歌德，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自从他对一切孱头都大事称赞以来，受他责备反而是个光荣。他害怕一切正在日益成长的泰坦巨人。”歌德老人的这一缺点，可惜竟是真的。海涅曾经热情洋溢地把自己的诗集献给歌德，并且不止一次写信给他表示仰慕敬

^① 见《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一章第九节：“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啊朋友，我要为你们制作！”

爱之忧，可是歌德毫无反应。歌德不仅对海涅冷淡，对其他新秀（例如克莱斯特）也是如此。

然而，到了歌德晚年，尤其在歌德去世以后，德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反对歌德的浪潮。“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极右派和极左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歌德。当身披黑袍的僧侣手持十字架照他打去之际，愤怒的无套裤党人也举起长矛向他刺来。”就在这时，海涅却捐弃个人的恩怨，挺身而出，捍卫歌德。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用美好的语言赞扬了歌德为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所作的卓越贡献，把歌德称作“我们文坛的君王”，把他比作拿破仑，丘比特。关于他和歌德的关系，海涅在书中强调地提醒读者注意：他从没有攻击过作为诗人的歌德，从没有指责过他的作品，从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发现过什么缺陷。如果海涅在歌德身上除了“天才诗人”的一方面，还攻击过他的另一方面，那么那正是恩格斯所指出的歌德身上的“庸人”一面。即使这样，海涅也从来没有公开攻击过歌德，而只是在私人信札里对歌德为人说过几句责备的话罢了。通过歌德的例子可以看出，海涅作为文艺批评家，不仅有过人的鉴别能力，而且有过人的道德力量。事实上，不止是对于歌德，海涅对于任何作家都没有以个人的好恶来左右自己的判断，更没有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而是力求对作家的辛勤劳动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他肯定奥·威·施莱格尔和蒂克的莎士比亚德译本就是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最后，我们要请读者注意海涅这些理论文章的文体。海涅在评论浪漫派领袖奥·威·施莱格尔时，还对他的语言表示过赞赏，特别是他用流畅潇洒的语言论述科学题材的能力。海涅肯定施

莱格斯的这一优点，是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的又一证明；其实他自己的学术文章比施莱格尔写得更加优美潇洒、光采夺目。如果说施莱格尔的文章是一个精通德语的学者的手笔，那么海涅的文章则是诗人的手笔，处处令人感到诗意盎然。读者不妨翻阅一下《论浪漫派》中几个出色的章节，看看海涅是怎样评论福凯杰出的童话小说《涡堤孩》的，是怎样描写了作为诗人布伦塔诺的缪斯的那位中国公主和诺瓦利斯热恋的那个死于痲瘵的少女莎菲·封·屈恩的。此外，还请看看《论法国画家》一文中对画家德拉克洛瓦的杰作《自由女神》和德冈的《夜巡者》的评述。这些评论和描写至今读起来我们还觉得新颖别致，不落陈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佛罗伦萨之夜》一文中对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演奏所作的精彩描写。

《佛罗伦萨之夜》原是海涅的屈指可数的几篇小说中的一篇，写的是青年马克西米连在他的恋人玛利亚的病榻旁边度过的两个夜晚。玛利亚得了不治之症，卧床不起，为了使她忘却病痛，他俩便天南海北地谈论各种事情。关于意大利天才提琴演奏家帕格尼尼的这一段文字，便是两人谈话的一部分。帕格尼尼的身世极为离奇，青年时代便闻名遐迩，可是后来因为杀死情妇受到严刑惩罚，在苦役船上服劳役多年。由于他的演技高超，人们谣传他有魔鬼暗中相助，据说他已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海涅在这里描写了帕格尼尼在汉堡举行的一次十分成功的独奏音乐会，这段描写可以看作是一篇奇特的文艺评论。他把帕格尼尼的身世、遭遇和他的演奏巧妙地结合起来，让人看出这位大师出神入化的演奏技艺，实际上是抒发内心深处隐秘感情的手段。这段文字有声有色，璀璨夺目，通过描写帕格尼尼卓越的音乐天才，充分显示了诗人自己出众的写作才能。